

曾明星,李桂平.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异质性及其传导路径[J]. 江苏农业科学,2017,45(11):252-258.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7.11.067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异质性及其传导路径

曾明星^{1,2}, 李桂平²

(1. 吉首大学软件服务外包学院,湖南张家界 427000; 2.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农民专业合作社明显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与市场谈判地位,为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质性促进农户认同的形成,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的前提。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社会流动、社会分工与社会分化,相对同质的成员结构被打破,异质性趋势愈来愈明显。成员异质性主要表现为资源存量异质性、产出异质性及行为属性异质性等,分别通过不同的资源投入、内部交易量与行动取向影响合作社绩效。资源投入与交易量是合作社实现绩效目标的中介变量,组织因素与环境因素是主要调节变量。可以通过优化调节变量,进而影响中介变量,降低或消除异质性的负面影响,激发异质性的正面作用,引导成员全身心投入合作社,形成发展合力。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异质性;中介变量;调节变量

中图分类号: F321.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1302(2017)11-0252-07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已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生力军。到2015年12月底,全国已登记注册的农民合作社达153.1万家,比2014年同期增长18.8%,实际入社农户10 090万户,约占农户总数的42%^[1]。合作社显著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与市场谈判地位,在帮助农民增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供给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2]。它是一种为了共同利益而结成的契约组织^[3],是基于相同或相似特征的农户联合,农户同时作为所有者与惠顾者参与合作社经营管理,如同奥尔森提到的小集团一样,农户为了共享集体物品,实现共同利益而结成组织^[4]。同质性促进农户认同的形成^[5],是合作社组成的前提,其投入与产出品同质性是农户联合的基础。一般来说,农户的同质性越高,合作社内部达成一致行动的愿望与目标的可能性越大,农户之间的矛盾相对越小,协调更加容易,治理结构也相对简单^[6]。虽然同质性有利于满足合作社的原则,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合作社内部相对同质的成员结构逐渐被打破,呈现出异质性、多样性等特点,尤其是异质性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7]。异质性会给合作社带来什么影响及如何影响绩效?如何克服异质性的负面影响?是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目的。

1 文献综述

收稿日期:2016-12-02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编号:14YBX024);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编号:13BSH070)。

作者简介:曾明星(1970—),男,湖南新化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组织与社会管理研究。E-mail: zengmingxing@126.com。

1.1 异质性释义(heterogeneity)

国内外学者对异质性进行了界定。异质性,国外通常称为不均匀性、多相性。美国社会学家彼特·布劳认为,异质性是指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布,可由某个特定类别参数表示^[8]。Knippenberg等认为,异质性是指社会群体之间的主观或客观的分类属性^[9]。国内学者徐长福认为,异质性是指属性之间具有各不相同的特点^[10]。张荣翼则认为,异质性是指一种在主流话语形成之后,那些未能进入到主流话语的一种称谓,在某种程度上,异质性和边缘性有着相似的关系^[11]。《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呼吁各国对农民在社会经济方面存在的异质性给予重视。合作社成员异质性是指由于成员条件的差异而产生的动机和行为属性等的差异^[12]。有学者以利益诉求、个体能力、社会关系等均趋同的成员结构特征为主流地位(参考系),把合作社成员异质性界定为有别于传统合作社成员特征的差异化,并认为利益诉求的差异是成员异质性的根本^[13]。

1.2 异质性的表现

国外学者Iliopoulos等认为,合作社成员异质性表现为成员特征、资源禀赋、所处产业链的位置、经营和联盟方式、生产技术、产品创新和市场策略^[14]。Berkhout等认为,农户在财富拥有、收入来源、资源禀赋、社会资本、生产潜力、人口状况以及营销策略等方面具有异质性特征^[15]。

对国内诸多学者关于合作社成员异质性的表现进行整理^[3,5-6,13,16-17],详见表1。

人口统计学特征、资源禀赋差异是合作社成员异质性特征的本质表现,导致个体诉求与行为属性、产出水平、个体策略与能力等异质性,最终结果则反映在成员的资源投入等参与程度的异质性上,进而形成异质性的合作社成员结构,即核心和普通社员、大户与小户社员、股东与非股东社员、大股东与小股东社员等^[5]。

表1 合作社成员异质性表现

异质性类型	异质性表现
人口统计学特征	户主类型、家庭成员数量、结构、年龄、受教育程度
资源禀赋	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
诉求与行为属性	个人特征、风险与需求偏好、角色定位、目的动机、利益诉求、期望
个体能力	创新能力、决策能力、社交能力
个体策略	市场策略、投资策略、生产策略
产出水平	产品种类、生产规模、产品质量、生产成本、技术水平
参与程度	要素投入、出资(或股份)、交易量、对合作社的贡献
象征性资本	声誉、社会地位
社会经济条件	区位、消费群体、政策

1.3 异质性影响

Berglas最早从生产的角度阐释了异质性社区,认为异质社区优于同质社区^[18]。Olson研究发现,在存在一定程度不平等现象的小集体中,即成员之间规模不等或对集体物品的兴趣差异较大,成员之间合作的可能性相对更大,提供集体物品的可能性更高^[19]。因此,异质性有利于农户达成合作并成立合作社,尤其在合作社发展初期,异质性有助于吸引核心农户的资本、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等稀缺要素^[3]。并且异质性农户在技术、资源与能力等方面存在互补性,可以促进农户之间相互学习,进而促进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带来创新效应^[4,7]。但异质性也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如(1)委托代理问题。异质性成员合作社容易产生核心成员(“大农”)、普通成员(“小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从而使合作社偏离其本质属性^[20]。核心成员通常是生产大户、营销大户、大股东,占有合作社的重要席位(如理事会成员),拥有主要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3],极易作出侵害普通成员利益的行为。而普通成员是合作社的参与者、跟随者^[5],往往存在机会主义与“搭便车”的行为,对合作社的忠诚度低,这就造成合作社的组织效率低,集体行动难,动摇了合作社发展的基础^[21-22]。(2)成员在要素禀赋、要素投入、参与动机、风险承担等方面的异质性,会严重影响合作社的治理结构、组织机制,进而影响成员的利益分配与平衡及合作社的决策制定和服务方式^[7]。(3)决策与缔约成本增加。合作社的决策方式通常是“一人一票”制,决策过程也就是成员之间通过“讨价还价”而达成一致目标的过程,由于成员的利益诉求、需求偏好及角色定位的异质性,并且异质性程度越高,形成一致决策的难度越大,决策与缔约成本越高^[5]。(4)合作社对成员服务的供需对接结构失衡^[23]。成员之间产品异质性可能导致合作社内部交易难以达成,进而影响价格风险的规避和农产品供给的稳定性,并且单位同类产品分摊的成本上升,抵减规模经济的作用。

现有研究大多从资源禀赋差异入手分析成员异质性表现,将成员异质化约为核心成员与普通成员,并分析成员异质性对合作社的影响。然而,成员异质性的表现与影响因素较多,且随不同情境变量的作用将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现有研究不便于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克服异质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提升异质性的正面作用。

2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异质性形成的逻辑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同步发展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和农业现代化。城镇化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并在城镇聚集的过程,也是农业人口由封闭、落后的农村社会向开放、文明的现代城市社会变迁的过程,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城镇化有力地拉动了农业现代化,从而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24]。农业现代化增加了农村收入的同时,减少农业劳动力的投入,产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剩余人口转移到城镇,又反过来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25]。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农民具有高度的同质性,表现为文化程度低、贫穷、小农生产方式等,伴随向市场经济转变,农民之间的异质性也随之加大。

2.1 城镇化—社会流动—异质性

城镇化过程催生了大量的社会流动现象,提高了社会开放度。社会流动包括人们在各社会位置之间的流动,如职业流动和迁移、信仰的变化、收入变化、就业或失业以及政治联盟的变化等^[8]。一方面,城镇化形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拉力”,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与创业机会,城乡间的发展差异也加大了人口流动的势能^[26];另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也需要向城市转移,形成“推力”。这2种力的共同作用导致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流动。托达罗模型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取决于人们在城市里获得较高收入的概率和成为失业者风险的权衡。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的边际劳动报酬高于非外出劳动力,同时,部分劳动力转移出去后,其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也相应提高,从而有利于农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27]。除了城乡间经济利益的差异以外,由于城市公共设施与服务等正外部效应,农民也会产生对城市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从而加大了社会流动的力量。城镇化诱致社会制度变迁,如土地流转、户籍、医疗保险、住房、养老等制度逐步放开与市场化改革,为农民享受市民待遇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了农村人口的流动。

我国城镇化引起的社会流动更多的是乡—城的流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方式大多为劳务型^[27]。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5年农民工总量为2.77亿,其中外出务工农民工1.69亿,占全部农民工的61%,外出务工农民工月收入比本地务工的高20.78%^[28]。大量社会流动不但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而且为农民工返乡创业积累了资本,提升了农民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使他们获得了大量的市场需求信息,树立了市场意识、风险意识与创新意识。但各农户家庭存在劳动力数量与受教育程度、职业选择等的差异,导致农户外出务工收入整体增加的同时,也加大了收入差异、能力差异。合作社成员中有些家庭不但有农业收入,还有打工

收入;也有些成员因家庭人员的社会流动(弃农经商、打工、迁移至城市)或年迈力衰而缩小了生产规模,甚至使土地“抛荒”。这样合作社成员之间的能力与素质、技术与知识、收入与产出等方面异质性不断变化且扩大。

2.2 城镇化—社会分工—异质性

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促进社会分工,城镇化是在空间布局上通过不断地把人口和产业聚集到城镇,缩小了人们之间的自然距离,增加了整合性群际交往的机会和可能性^[8],从而大大降低了现代化大生产过程中各工序、各产业部门之间协作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成为促进社会分工深化的一种重要方式^[29]。城镇化增大了社会密度和社会容量,提高了社会的集约化程度,这是分工发展的根本原因^[30]。城镇化提高了人们的购买力水平是因为生产效率的提高,而生产效率的提高又是分工深化的结果。分工越深入,生产链条延长,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交易量越大,“人人买得多,卖得也多”,市场规模也就越大^[29],而市场规模的增大又反过来促进分工的深化与专业化。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和专业化主要受市场规模的制约。他说:“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31]。”因此,人类社会遵循城镇化—社会分工—生产效率提高—市场需求扩大—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的发展逻辑。随着社会分工深化,成员选择不同的行业,从事不同的职业,经营不同的产业与业务,通过运用不同的科学技术与生产要素,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机械化和规模化,整体生产效率显著提高的同时也加大了效率与效益的差异,导致合作社成员的收入、生产规模、技术水平等呈现出较大的异质性。

2.3 城镇化—社会分化—异质性

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反过来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变革。社会分工、社会分层和系统功能分化为社会分化的 3 个基本维度,社会分工是社会分层与系统分化的基础与条件,是社会分化的前提。由社会分工所产生的职业、身份等的分化而形成了人群、阶层、阶级、利益等的不断分化^[32]。城镇化是社会空间转向和社会结构调整的过程,对社会成员构成产生直接和巨大的影响^[33]。市场竞争机制、价值规律导致优胜劣汰,人们的价值取向、生产方式、劳动方式、职业选择、收入水平、文化素养等产生差异而分化为不同的阶级、阶层,农村人口数量减少,农

民阶层多元分化。如有的升学、参军、提干;有的经商、办企业;有的外出打工成为农民工;有的成为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工人;有的继续从事农产品的生产。从年龄特征来看,可以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前者生活方式接近传统农民,后者近于市民,后者相对受教育程度高、对未来的期望高,但务农经验少,吃苦耐劳能力较差。从结果上看,农民阶层迅速分化为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工人、农民工、个体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家庭农场主、知识分子与社会管理阶层等,也有从事简单劳动的蓝领、失业者、破产者和其他特殊困难的群体^[33]。合作社成员因农民阶层的多元分化在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社会资本、文化素质、经营业务与规模等方面呈现出更大的异质性。

3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异质性对绩效的传导路径

3.1 成员异质性传导路径分析框架

合作社的绩效是农户成立合作社的动因,成员满意是合作社的最终目标^[34]。成员越愿意将自己的各种资源投入合作社,形成合作社的整体力量,越有利于提高合作社的绩效;成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含生产资料和产品)越大,越有利于合作社分摊固定费用,降低运行成本,提高市场谈判地位,实现规模经济。在城镇化背景下,加快了社会流动、社会分工与社会分化的进程,由于成员先赋资源的异质性及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扩大效应,资源拥有量不断扩大的同时,资源存量的异质性增大,导致成员的行为属性、产出的异质性增大,反过来促进资源存量的异质性增大。成员异质性对于合作社绩效、成员满意度等结果变量而言具有双重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在宏观因素与组织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成员异质性增大将影响成员对合作社的资源投入与交易量,进而影响合作社绩效。关键问题是成员异质性增大是增加还是减少成员对合作社的资源投入与交易量?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影响,所以宏观因素与组织因素是影响合作社绩效的主要调节变量。具体化在人身上的能力异质性等,可以归至资源存量中的人力资源异质性,为了简化分析过程,重点分析资源存量异质性、行为属性异质性,产出异质性在宏观因素与组织因素等调节变量的影响下,如何影响成员的资源投入与交易量。因此,资源投入与交易量是成员异质性对合作社绩效影响的中介变量(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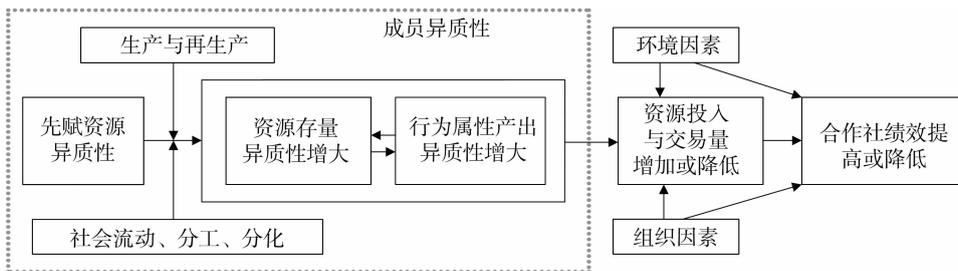


图1 成员异质性传导路径分析框架

3.1.1 概念界定

3.1.1.1 资源 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社会资源。自然资源通常有矿物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

资源与生物资源等,农户的自然资源主要是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农民通过承包土地或土地流转获得的经营自主权。人力资源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最为关键,如生产技术、

管理技术、企业家才能等能提高生产效率,带来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开拓新市场,还能作出高瞻远瞩的发展战略,在合作社产业链延伸及价值创造的过程中所作的贡献更大,并可成为成员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具有较好声誉和较高社会地位的社会精英是合作社的符号资本与无形资产,能为合作社带来潜在收益。资本资源的投入是合作社做大做强的基础,包括用于生产经营的基本要素,如资金及厂房、设备、材料等物质资本和可筹集的社会资金。社会资源是个人在社会网络中可以运用的其他人的资源,是通过社会网络和直接与间接接触能动员的资源总体。社会资源理论认为人们的社会资源越多,越能得到他人的帮助,职业成功的机会越大。

3.1.1.2 先赋资源与资源存量 成员所拥有的资源存量受到先赋资源的影响(图1)。先赋资源是与生俱来的,如性别、种族等,是被继承限定的,还有等级和宗教,此外还可以包括父母的资源与财产。不同的先赋资源如天赋、性格等决定了个体适合从事的不同工作;不同的家庭背景与条件决定了不同人的受教育的程度与价值取向。合作社成员的先赋资源界定为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农民通过承包土地获得的经营自主权(不包括流转土地)、家庭原始积累、初次受教育程度(不包括再教育)与社会关系等。

资源存量是指组织或个人现存的全部资源,通常可反映现有的生产经营规模和技术水平。先赋资源经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资源拥有量将发生变化,此时的增量资源被称为后赋资源。如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可以增加或

减少;资本资源随着成员从事不同的职业、业务,选择不同的策略、经营行为,影响资本的再生能力;人力资源随着接受再教育、工作经验的积淀,品性、素质、能力、技术、知识、思维也在培养、学习和构建中提升;社会资本在人们所在网络或群体中的联系和互动中发生作用,在资源的再生产过程中不断扩大。

3.1.2 合作社异质性成员的类型 异质性结构可分为分布结构与特征结构,前者表示农户差异存在程度上的大小,后者表示农户的各种资源、行为属性、产出等异质性变量的组合特征^[35]。不同的组合方式将组成不同的异质性成员类型。根据学者们的观点,尽管成员异质性的表现多种多样,但从资源拥有上看,异质性表现为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源的异质性,个体能力与策略、人口统计学特征等方面的异质性都可以归为人力资源异质性;从结果上看,最终表现为农户产出规模与收入等异质性。从农户农业生产规模、收入及非农收入2个维度考察,异质性农户可分为4种类型,详见表2。合作社原有异质性成员结构为核心成员和普通成员,其中核心成员一般为生产规模较大、收入较高、能力较强的“大户”,普通成员主要为生产规模较小、收入较低、能力较弱的“小户”。经过几年的发展,核心成员和普通成员都有可能分化为以上4种异质性农户类型,因此,合作社异质性成员结构可能有8种类型:Ⅰ类核心成员、Ⅰ类普通成员、Ⅱ类核心成员、Ⅱ类普通成员、Ⅲ类核心成员、Ⅲ类普通成员、Ⅳ类核心成员、Ⅳ类普通成员。

表2 异质性农户类型与特征

农户类型	异质性度量	异质性特征				
		自然资源	资本资源	人力资源	社会资源	其他
Ⅰ类	农业生产规模大、收入高,非农收入高	多	多	知识技术经验丰富	丰富	多样化收入来源;农业生产规模化;打工、经商、财产收入高
Ⅱ类	农业生产规模大、收入高,非农收入低	多	多	农业知识技术经验丰富	农业社会资源丰富	以农业规模化生产收入为主
Ⅲ类	农业生产规模小、收入低,非农收入高	少	多	非农知识技术经验丰富	非农社会资源丰富	以打工、经商、财产收入为主
Ⅳ类	农业生产规模小、收入低,非农收入低	少	少	匮乏	匮乏	自给自足生产;贫困阶层

3.2 合作社成员异质性的传导逻辑

对于Ⅰ类、Ⅱ类、Ⅲ类、Ⅳ类合作社核心成员,因拥有合作社的主要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易于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决策,自身的利益与合作社的利益容易保持一致,除了Ⅳ类核心成员因资源匮乏以外,大多数成员愿意向合作社投入资源

并与合作社进行交易。而对于Ⅰ类、Ⅱ类、Ⅲ类、Ⅳ类非核心成员,资源存量异质性、产出异质性、行为属性异质性在宏观因素与组织因素等调节变量的作用下,将影响其对合作社的资源投入与交易行为(表3)。

表3 成员异质表现与调节变量

成员异质性表现		组织调节变量	环境调节变量
资源存量	自然资源	利益分配制度	土地流转政策
	资本资源	治理结构与机制	资本回报率
	人力资源	社会认同;社会整合;激励与约束机制;知识共享机制	社会信任机制;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
	社会资源	社会认同;社会整合;激励与约束机制	社会信任机制
产出		定价机制;销售渠道成本	市场价格
行为属性		领导能力;团队反思;组织文化	政府政策

3.2.1 资源存量异质性—资源投入—绩效 资源存量异质性是指合作社现存的全部资源的异质性,主要包括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等。

3.2.1.1 自然资源异质性 在城镇化进程中,部分农户变成了“失地”或“少地”农民,可能会获得土地补偿,属于Ⅲ类异质性农户;部分农户因为年迈力衰而退出劳动力市场或农村

劳动力外出务工而导致土地抛荒,属于Ⅲ类或Ⅳ类异质性农户;也有一部分农民因为规模经济的驱动,通过土地流转获得了更多的土地使用权,成为Ⅰ类或Ⅱ类异质性农户。在自然资源异质性增大的情况下,农户是否愿意将更多的土地投入合作社,主要取决于:(1)土地流转政策,如果土地流转政策能够保障“抛荒”土地承包人的权益,合作社易于采取土地流转的方式获得Ⅲ类或Ⅳ类异质性成员的土地投入,反之,成员不愿意将土地投入合作社;(2)合作社的利益分配制度,如果合作社的利益分配机制优先保证土地等自然资源投入的回报率,且这种回报率高于成员自己经营土地的收益或机会成本,则拥有较多土地使用权的成员都愿意以土地入股的方式投入合作社。

3.2.1.2 资本资源异质性 城镇化过程中,社会分工深化提高了生产效率,加快了农村资本资源积累的速度,农村收入总体提高的同时贫富差距拉大。国家统计局2016年1月发布的数据表明,2015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达0.462^[36]。由于农户先赋资源存在异质性,农户从事不同的职业,选择不同的经营策略,农户资本积累的速度存在较大差异,导致资源存量呈现较大的异质性,部分农户有较多的剩余资本或可筹集的资本。另外,资本类型也存在差异性,如资金与各种实物资本。资本资源异质性增大,具有较低资本存量的Ⅳ类异质性成员,很少有资本可投入合作社,对于具有较高资本存量的Ⅰ类、Ⅱ类、Ⅲ类异质性成员是否愿意将更多的资本资源投入合作社在于2个方面。(1)投资其他行业与投资合作社的回报率的大小。宏观经济越景气,投资其他行业的机会越多,收益越高,而投资合作社的回报率低,机会损失越是高于投资合作社的回报,资本异质性的增大不利于成员投入合作社,反之,投资其他行业的机会少,回报率越低,越有利于成员投入合作社。(2)合作社治理结构与机制。合作社的治理结构越能保证投资者的利益,而非少数人控制,资本资源异质性的增大越有利于资本存量高的Ⅰ类、Ⅱ类、Ⅲ类非核心成员投入合作社,反之也是如此。如果合作社主要为少数核心成员或理事会成员控制,民主化程度低,核心成员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决策,只能吸引Ⅰ类、Ⅱ类、Ⅲ类核心成员的资本投入合作社,而对于大部分非核心成员,因他们对合作社控制能力较弱,尽管当时拥有的资本存量较高,因担心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也不愿意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合作社。

3.2.1.3 人力资源异质性 城镇化加快了社会分化的速度,农户分化成不同的阶层,他(她)们的素质、能力、知识结构、技术背景、能力类型等呈现较大的异质性。信息加工理论认为,来自不同职业、背景、教育程度、价值观、技术、信息等构成的异质性组织,是成员信息交换和知识共享的源泉,是团队创新和团队绩效的可靠保证^[35],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的特性^[27]。知识异质性是创新的源泉,协作创新发生于技术知识、市场知识、管理知识3种异质性知识的交换过程中^[35]。但异质性程度高的组织又易出现组织断裂带^[35],导致社会分层,产生身份界限,减少成员间的交流与沟通,滋长组织内冲突,使组织凝聚力下降。异质性成员尤其是Ⅰ类、Ⅱ类、Ⅲ类非核心成员是否愿意将自身的知识、技术与经验等智力资源投入合作社并发挥最大作用,主要与以下6种调节变量相关。(1)社会认同。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是社会成员共有的信仰、价

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表现,是增强内聚力的必要条件^[37]。Tajfel等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对群体的认同是群体行为的基础,人在不断追求自我形象和自我概念的完善,在强调以人为本的组织中,成员能够发现他人的优点和长处,接受和包容他人的不足,促进人际融合^[38]。社会认同感强的组织凝聚力强,异质性将促进成员间的合作与知识共享;反之,不利于成员将自己的智力资源投入合作社。(2)社会整合。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认为社会整合是社会体系内各部门的协同关系,可使体系达到一种均衡状态。高社会整合度创设了一种合作、愉快的氛围,体现了团队的凝聚力、认同感和满意度,团队成员为了团队的成功将更加努力地工作,缩短成员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交流。Polzer等认为只有在高“人际协调”时,知识技术的异质性才对绩效产生更大的积极作用^[39],这就要求组织具有很高的协同整合能力,加强信息交流,营造良好的氛围,减少恶性冲突。(3)激励与约束机制。“经济人”假说认为经济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总是希望而且能够谋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利益、权利、地位等的激励约束机制,根据组织目标和人的行为规律,通过各种方式去激发人的动力,使人有一股内在的动力和追求,迸发出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规范人的行为,朝着激励主体所期望的目标前进。激励约束机制越能促进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高度一致,越能激发异质个体的潜能,发挥异质性知识与技术的互补作用。(4)知识共享机制。信息不对称是产生“囚徒困境”的根源,人们从个人理性出发所选择的占优策略通常是整体最差的策略。合作社成员之间的知识与技术共享同样存在“囚徒困境”问题,关键在于是否建立了一种互惠互利的共享共赢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有效防止“理性”人违背合作协议而搭便车的行为。(5)社会信任机制。合作社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内部信息的交流更多是非正式的,忠诚和信任等社会机制将发挥重要作用。社会学家奥格尔·齐美尔(Georg Simmel)在《货币哲学》中强调了社会信任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地位,认为信任促进了交换,是社会中的重要推动力量。社会分工的深化使人们的共有知识减少^[32],人与人之间的知识异质性增大,社会信任机制越完善,越能整合合作社成员的异质性知识,成员越愿意投入自己的知识与技术。(6)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异质性成员拥有并投入合作社的专有技术、经验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成员越愿意投入自己的智力资源。

3.2.1.4 社会资源的异质性 在高度分化的社会,每个人的家庭背景、教育与成长经历不同,社会关系差异较大,社会资源的拥有也存在很大的异质性。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一个人拥有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这个网络成了此人所拥有的实际或潜在资源。每个被联系在其中的成员可以从中获益,获益的大小依每个人的能力大小而有所区别。同样,合作社成员可能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源,具有很大的异质性,Ⅰ类成员可能具有广泛的各种社会资源,Ⅱ类成员可能拥有较广的农业方面的社会资源,Ⅲ类成员的非农社会资源可能较丰富,Ⅳ类成员的社会资源也可能非常贫乏。Ⅰ类、Ⅱ类、Ⅲ类异质性成员拥的社会资源,是否愿意投入合作社,其分析过程类似于人力资源异质性的分析。

3.2.2 产出异质性—内部交易—绩效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社会分工的深化,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不同农户所拥有

的资源具有高度异质性,导致不同农户生产的产品种类、规模、质量、成本、技术水平呈现较高的异质性。Ⅰ类、Ⅱ类成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程度、专业化程度、产品质量高,生产成本低,农业收入高,Ⅲ类、Ⅳ类成员相对农业产出水平低,农业收入低,可供销售的农产品少。成员是合作社的惠顾者,产品的异质性增大时,产出水平较高的Ⅰ类、Ⅱ类成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取决于以下2个调节变量。(1)市场行情与定价机制。农产品市场行情越好,产品质量越高,内部交易价格越低,成员自行在市场上销售农产品可能获得的收益越大,尤其Ⅰ类、Ⅱ类非核心成员越不愿意将产品交给合作社销售,反之一样。这种现象成为合作社健康发展主要障碍之一。(2)成员自行建立销售渠道的成本与合作社的成本。若成员的专业化程度不高、生产规模不大、技术水平有限时,成员自行建立销售渠道的成本高于合作社的成本,Ⅰ类、Ⅱ类非核心成员也愿意通过合作社销售产品;反之,则不愿意通过合作社销售产品。

3.2.3 行为属性异质性—行动取向—绩效 因成员拥有的资源存量、能力、选择的职业与业务策略不同,其风险与需求偏好、心理特征、角色定位、目的动机、利益诉求、期望、认知等行为属性产生明显的异质性特征。行为属性异质性如认知异质性能使团队成员拥有更广阔的知识视角、想法,有效避免群体思维,从而有利于提高创造力与组织绩效;团队成员的心理特征如自我效能感越强,认知异质性水平越高,组织的整体创造力越强^[35]。但认知异质性会对团队决策过程产生负面影响,降低决策质量。合作社成员的行为属性异质性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成员对合作社的资源投入和产品交易,如具有风险偏好高、期望很高、创业动机强烈的Ⅰ类、Ⅱ类普通成员,更倾向于自己开发市场,成立公司或带头成立合作社,而非以普通成员的身份向合作社投入更多的资源并通过合作社销售产品,反之也是如此。行为属性异质性的影响除了本身因素,还与下列调节变量有关,(1)领导能力。领导者的沟通能力与人格魅力至关重要,通过与成员充分沟通,引导成员对自身角色重新定位,改变成员的目的动机、利益诉求与期望,进而建立与成员目标高度一致的合作社目标,提高成员对合作社的忠诚度。(2)团队反思。团队反思是指团队成员对团队目标、策略、程序进行公开反思,以使他们适应当前或预期的环境变化,通过团队反思能降低团队成员的行为属性差异,削弱目标导向异质性对团队绩效的不利影响。(3)组织文化。民主、平等、公平的组织氛围,乐于奉献、诚实守信、互帮互助、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精神,可以缩小成员之间的认知、期望、偏好等方面的差异。(4)政府引导和扶持政策。一方面,政府的扶持政策可以直接或间接提高合作社的经济效益,容易实现成员的利益目标、期望,有利于成员向合作社投入资源并为之进行交易;另一方面,政府的引导与扶持政策可以影响合作社及成员的心理预期,提高他们向合作社投入的信心。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同质性促进农户认同的形成,是合作社成立的前提。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社会流动、社会分工、社会分化,导致相对同质的成员结构被打破,异质性已成

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合作社成员异质性对于合作社绩效、成员满意度等结果变量而言是一柄“双刃剑”,既有正面的作用,又有负面的影响,可能导致合作社的组织效率低,集体行动难,甚至使合作社分裂。(2)在合作社发展初期,产权结构主要为核心成员与普通成员。学者们认为这是吸引核心成员贡献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等稀缺要素的先决条件,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但经过多年发展以后,随着社会的高度分化,核心成员与普通成员都有可能分化为Ⅰ类、Ⅱ类、Ⅲ类、Ⅳ类异质性成员,增加了农户之间的矛盾,尤其是Ⅰ类、Ⅱ类、Ⅲ类非核心成员更倾向于违背合作协议,另谋发展出路,对合作社的长期健康发展带来剧烈冲击。(3)合作社成员异质性主要表现为资源存量异质性、产出异质性及影响其投入合作社的行为属性异质性等,分别通过不同的资源投入、内部交易量与行动取向影响合作社绩效。成员异质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应人为控制或消除异质性本身。(4)异质性成员是否愿意将其资源投入合作社并与合作社进行交易,是合作社实现绩效目标的中介变量。组织因素与环境因素是合作社实现绩效目标的主要调节变量。通过优化调节变量,进而影响中介变量,减少或消除异质性带来的负面影响,激发异质性的正面作用,引导异质性成员全身心投入合作社,形成发展合力。

4.2 建议

主要通过调节变量影响异质性成员的行为,使之既愿意向合作社投入资源,又愿意与合作社交易。

4.2.1 优化组织调节变量 (1)完善治理机制。从“帕累托改进”和“激励相容”角度来看,合作社的治理机制应确保稀缺资源要素发挥最大作用,是一种合理并且有效率的制度安排^[4]。首先,根据合作社的发展阶段,实时调整合作社的核心成员结构,吸纳部分Ⅰ类、Ⅱ类、Ⅲ类非核心成员进入理事会、监事会或管理层,吸收其资本,调整股权结构,充分发挥稀缺资源要素的作用。其次,完善“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与决策机制,让普通农户能更多地参与合作社事务和分享合作收益,防止少数核心成员侵害普通成员的利益。(2)健全利益分配制度。在不违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前提下,确定合理的交易额返利率与内部交易价格,并且内部交易价格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及时调整,总的原则是成员通过合作社销售产品比自己在市场上销售产品获利更多,既能吸引成员尤其是Ⅰ类、Ⅱ类、Ⅲ类非核心成员向合作社投入资源,又愿意与合作社发展业务。(3)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从核心成员和普通成员2个角度,根据大股东、生产大户、管理者、普通农户等参与者的不同特点建立具有针对性的激励机制,从情感道德、入社条件、生产过程、惩罚制度等方面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既能调动全体成员的积极性,又可以抑制成员的不规范行为。(4)塑造组织文化。加强内部信息交流、异质性互动、知识共享,营造一种民主、平等、公平的组织与团队氛围,运用团队反思,塑造良好的组织形象,建立社会认同感强的组织,增强合作社的凝聚力与向心力。(5)提高管理水平。建立健全合作社内部管理制度,降低运行成本,提高管理效率;重用优秀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提高组织的社会整合能力,开拓新市场,发展新业务,提高资本回报率,以提高成员投入资源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吸引Ⅰ类、Ⅱ类、Ⅲ类非核心成员向合作社投

入资源。

4.2.2 完善环境调节变量 (1)完善土地流转政策。制定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办法,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服务机制,提供土地价格评估、政策咨询、契约签订、过户登记和公正等服务,降低土地流转交易费用,确保土地流转双方的利益。(2)政府加大对合作社的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扶持力度,正确引导合作社健康有序发展;建立健全社会信任机制,降低监督成本与“搭便车”行为;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提高成员投入专有技术与经验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 [1]房宁. 全国42%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N]. 农民日报,2016-03-21(2).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 [3]林坚,黄胜忠. 成员异质性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所有权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07(10):12-17.
- [4]孔祥智,蒋忱忱. 成员异质性对合作社治理机制的影响分析——以四川省井研县联合水果合作社为例[J]. 农村经济,2010(9):8-11.
- [5]张靖会. 同质性与异质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影响——基于俱乐部理论的研究[J]. 齐鲁学刊,2012(1):86-90.
- [6]于会娟,韩立民. 要素禀赋差异、成员异质性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150-154.
- [7]黄胜忠,徐旭初. 成员异质性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结构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1-7,43.
- [8]彼特·布劳,王春光. 不平等和异质性[M]. 谢圣赞,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 [9]Knippenberg D V, Schippers M C. Work group diversity[J]. Annual Review Psychology,2007,58(1):515-541.
- [10]徐长福. 论人性的逻辑异质性[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5):80-87.
- [11]张荣翼. 现代性、对话性、异质性——中国当代文论的内在关键词[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90-97,101.
- [12]赵凯. 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异质性及其定量测定方法[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57-66.
- [13]邵科,徐旭初. 成员异质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影响——基于浙江省88家合作社的分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5-9.
- [14]Iliopoulos C, Cool M L. The efficiency of internal resource allocation decisions in customer-owned firms: the influence costs problem [R]. Washington D C: The 3r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1999.
- [15]Berkhout E D, Schipper R A, Keulen H V, et al. Heterogeneity in farmers' production decisions and its impact on soil nutrient use: results and implications from northern Nigeria [J]. Agricultural Systems,2011,104(1):63-74.
- [16]徐旭初,邵科. 合作社成员异质性:内涵特征、演化路径与应对方略[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4(6):571-576.
- [17]应瑞瑶,唐春燕,邓衡山,等. 成员异质性、合作博弈与利益分配——一个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机制安排的经济解释[J]. 财贸研究,2016(3):72-79.
- [18]Berglas E. On the theory of club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6,66(66):116-121.
- [19]Olson M.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 [20]崔宝玉. 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及其治理[J]. 财经问题研究,2011(2):102-107.
- [21]Bijman J. Cooperatives and heterogeneous membership: eight propositions for improving organizational efficiency [C]. The EMnet - Conference. Budapest, Hungary,2005.
- [22]韩喜平,李恩. 异质性视角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协同研究[J]. 学习与探索,2011(6):166-168.
- [23]何安华,孔祥智. 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成员服务供需对接的结构失衡问题研究[J]. 农村经济,2011(8):6-9.
- [24]张勇民,梁世夫,郭超然. 民族地区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2014(10):87-96,111-112.
- [25]裴长洪,于燕. 新型城镇化中的产业发展趋势[J]. 当代经济研究,2014(10):5-13,97.
- [26]辜胜阻,刘传江. 人口流动与农村城镇化战略管理[M].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 [27]董延芳. 移民异质性与经济发展[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 [28]国家统计局. 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 (2016-04-28) [2016-10-10].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28_1349713.html.
- [29]成德宁. 中国“贫困人口城市化”的趋势与对策[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7(5):37-41.
- [30]埃米尔·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渠东,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 [31]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 [32]杨建华. 分化与整合——一项以浙江为个案的实证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 [33]朱光磊,郭道久,孔超. 论城市化进程对中国阶层分化和阶层关系的影响[J]. 天津社会科学,2003(4):47-54.
- [34]张靖会. 农民专业合作社效率研究——基于俱乐部理论视角的分析[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 [35]倪旭东,张宏. 知识异质性团队、知识网络与团队创新[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 [36]2015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EB/OL]. [2016-10-02].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16-01-19/doc-ifxnqri9875090.shtml>.
- [37]李友梅. 重塑转型期的社会认同[J]. 社会学研究,2007(2):183-186.
- [38]Tajfel H, Turner J C.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J].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1979,33(47):33-47.
- [39]Polzer J T, Milton L P, Swarm W B. Capitalizing on diversity: interpersonal congruence in small work group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2,47(2):296-324.